

狄德罗的“怪物”与后人类——基于人的偶然性的解读

夏铮铮¹

(1.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48)

摘要: 狄德罗对“怪物”问题的研究继承并转化了培根“自然偏差”范式。其思想经历了从目的论到有机-机械唯物主义的转向: 早期接受夏夫兹博里的目的论自然观, 后因目的论解释失效而质疑自然秩序, 最终将怪物视为自然失序的偶然产物。这一认识揭示: 在技术进化论框架下, 只要人类变化仍具不可预测性且依赖自然, 其偶然性本质就无法被超人类主义的技术目的论所克服。

关键词: 狄德罗; 怪物; 超人类主义; 偶然性; 目的论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83

“怪物”(monstre)是法国哲学家德尼·狄德罗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十八世纪欧洲“怪物”和“怪异”(monstrosity)相关论争的关键人物之一, 狄德罗通常使用“怪物”一词描述对规则的违背或对常态的偏离, 并且借由“什么是怪物”这一关键问题对十八世纪中期占据思想界主流地位的生物预成论和自然目的论提出质疑和反对。“怪物”为何成为狄德罗有机-机械唯物主义的核心理论? 怪物问题何以最终指向“人是什么”这一更深层的追问? 又在何种意义上被视为在技术进化论背景下, 超人类主义者对后人类愿景的一种回应? 本文尝试对此展开讨论。

一、“怪物”从何而来

18世纪对“怪物”的研究可以被视为对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672年提出的研究框架的追随及发展。培根在《新工具》中倡导新一代科学家跳出那些充满迷信的怪物图鉴的影响, 编纂一份包含一切怪物和异常的自然史; 怪物的诞生不应再被视为某种预兆或启示, 而应该被视为更好地认识自然普遍规律的参照点: “熟悉自然路径的人, 将更易于观察其偏差; 反之, 了解其偏差的人, 将能够更准确地描述其路径”²。“怪物”(monstre)和“怪异”(monstrosity)成为理性研究的对象和理解自然及宇宙的基准, 这种观点被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在《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中吸纳与继承,³也成为构成狄德罗对生成与繁殖、秩序与偶然等主题进行讨论的思想前提; 尤其是在对秩序与偶然的讨论中, 正是对“怪物”的反思让狄德罗开始审视他曾经信奉的自然神论信仰体系的弱点, 并促成其唯物主义转向。正如福柯所言, 怪物和怪异“带有自然的僭越、物种的混合、界限和特征的模糊”⁴, 狄德罗的“怪物”是一个多义的构造, 必须基于一个动态的标准进行理解。

狄德罗对怪物的兴趣始于对夏夫兹博里(Anthony Ashley 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论美德与功德》的翻译, 彼时他坚信一个普遍的天意, 即从自然中的无机物、植物、动物到人类都是一个具有综合协调性规律的宇宙的一部分, 由一个自然而明智的神将他们有序组织为一个伟大的整体; 自然具有终极原因, 导向整体和谐的目的。伴随十八世纪中叶实验科学中的发现, 狄德罗表现出一种信念, 即科学方法促成的人类知识进步导向一种经验的综合, 可以同时揭示宇宙的形而上学起源与造物主的意图; 但其中也隐含着一种不安: 如果自然是一个目的论的整体, 那么那些可见的、与自然秩序相矛盾和冲突的现象——比如怪物——该如何得到解释? 狄德罗最初诉诸一种莱布尼兹式的回答: 宇宙表现出的失序是源于人类智慧因其自身局限性而无法对神的智慧全面理解的假象; 如果人类能如神一般看到整体或大全(tout), 这些局部的失序就可以被更大规模的秩序吸收。⁵在夏夫兹博里的体系中, 自然等同于神的意图, 一切自然生物都遵循着神的理性创造观念朝向完美设计的目的, 这与狄德罗

作者简介: 夏铮铮,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在读博士生。

² 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in *Novum organum, New Atlantis,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 Novum Organum / New Atlantis*,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Mortimer J. Adler Ed,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2, p159.

³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1.

⁴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1.

⁵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42-43.

的解释相同，但在对怪物的处理上，两人产生了分歧。夏夫兹博里通过一种偶然主义从自然创造秩序中排除了怪物，将其解释为神创之后意外遭受机械外力冲击而造成的结果。换言之，怪物的形成并非自然失序，而是来自另一种更强大的自然力量的作用，怪物被排除在自然整体之外。狄德罗对这个观点并不赞同：如果承认宇宙是一个整体或者大全，那么这个“大全”必须包含一切生物，包括怪物。⁶

随着对动物学、解剖学和昆虫研究的兴趣增大，狄德罗的问题变得清晰：在一个和谐自然整体中何以可能产生众多难以理解的现象？在自然界充满神的意图的宇宙中，怪兽怎么可能存在？这些有机过程的不和谐动摇了目的论的先验秩序，怪物的不可理解性最终促成一种唯物主义觉醒，及一直以来试图“将自然神论的负担置于生物事实上”的哲学体系的崩溃。⁷狄德罗以实验中得出的物理与自然科学结论作为证据巩固“普遍天意”的做法遭受其自身的质疑：“谁对你说，你在此地赞赏的这种秩序不会在某个地方被打乱呢？怎么能从空间的一点向无限的空间推论呢？自然目的论和宇宙的秩序再次被揭示为一个幻想和误导性的假设，宇宙如同放在人们面前的‘陌生的机器’，其‘秩序’或者‘无序’只是根据不同的观察者的意见得出的结论。”⁸而怪物则成为这种不确定性的坐标。

什么是怪物？狄德罗通常将“怪物”与用来描述怪异的词汇——如无序（desorder）和“自然的偏差（écart de la nature）”——并列使用，用来暗示“对规则的违背、概念上的不一致或矛盾”，但这些术语并不具有与他同时期另一种主流观点的相同意义：在这种观点中，怪物意味着超自然的状态。换言之，怪物的存在暗示存在另一种独立于自然秩序的现实秩序，即上文中夏夫兹博里所说的“另一种自然”。¹⁰虽然培根的研究范式试图将怪物归于“自然的偏差”，并以此作为纠正人类理性对自然秩序认知错误的纠正手段，但狄德罗最终拒绝了这个方法论。在狄德罗看来，正是培根人为地将怪物与自然其他部分区隔，预示了十八世纪的科学研究中对自然进行理性化排序的趋势，即如果自然必定是有序的，那么怪物也必须遵循自然秩序，因此怪物形态的出现也必须是可预测和有规律的。¹¹狄德罗拒绝将自然视为理性的知识对象的尝试：对自然的排序意味着这个秩序极有可能并非自然本身的秩序，“任何试图创造自然所谓协调和逻辑的转喻描绘的努力，任何试图将自然简化为静态力量的努力，都是荒谬的行为……自然处处表现出崇高的混乱”。¹²事实恰恰相反，怪物并不能澄清对宇宙和自然的错误理解，而只能表明“人属于一个不遵守合理性规律的自然的一部分”，¹³人类及其个体的生成是偶然发生的。“什么是怪物”这个问题背后隐藏了一个更核心的问题：人是什么？

“人是一根系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索”¹⁴，继尼采之后，超人类主义¹⁵者亦如是说。从某种程度讲，超人类主义者对自然和人类抱有与狄德罗相似的看法：两者都认为人类并非占据存在之链中预定等级的生物，而仅仅是一个介于动物与后人类¹⁶之间的变易形态、一个朝向灭绝并且可以持续变化的不稳定物种；两者都否认自然目的论，认为自然界生物的形态和功能并非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目标或预先设计。所不同的是，超人类主义者从两个方面以更为激进的态度对待自然和人类的未来：一方面，狄德罗认为人与怪物一样，本质上都是从自然的无序中偶然产生的物质形态，人类无法预知也无法控制人类个体的变异和种族的灭绝；而超人类主义者虽然承认生物进化遵循自然秩序，但自然秩序有其局限性，人类的进化路径和规则不应被局限于自然选择的框架内，而是应当主动干预自然秩序，以技术手段突破并超越自然限制：“生物进化已经让位于一个更快的进程——技术进化”，¹⁷人类可以通过基因编辑、纳米技术、脑-机接口等工具和途径改善生理和认知能力。另一方面，超人类主义者对目的论的态度充满矛盾：他们在否认自然目的论的同时主张一种技术目的论——人类放弃生物进化而选择技术进化的最终目的是在后人类形态中实现永生，在一种乐观主义假设中，技术将发展出高级宇宙智能，继而为自然和宇宙重新建立一种“实用”秩序——技术宇宙和技术自然，成为“将来之神”。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观点可以被视为对狄德罗提出的核心问题“人是什么”的当代反思和回应。

二、去形态化的人

在《达朗贝的梦》（Le Rêve de d'Alembert）中，狄德罗将人与怪物相提并论：“人只是（自然整体不停改变的）一个普通的结果，怪物只是个稀有的结果；两种东西是同样地自然，同样地必然，同样地存在于普遍的、共

⁶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45.

⁷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56.

⁸ 狄德罗：《怀疑论者的漫步》，陈修斋、张冠尧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第135-136页。

⁹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14.

¹⁰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13-14.

¹¹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14, p22.

¹²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24.

¹³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22.

¹⁴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2页。

¹⁵ 超人类主义与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概念澄清：前者主张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来增强人类的身体和认知能力，以超越当前的生理和心理限制；后者则强调超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重新思考人类与技术、自然和非人类实体的关系。但超人类主义者经常用“后人类”（posthuman）描述人类在技术变革中可能拥有的未来形态。

¹⁶ 后人类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如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来实现超越传统人类限制的人类状态，涉及对人类本质和存在的重新定义与反思。

¹⁷ 詹姆斯·A.赫里克：《人类未来进化史：关于人类增强与技术超越的迷思》，赵翌、陈天皓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44页。

同的秩序中……这有什么惊讶的呢？”¹⁸既然怪物作为一种自然的生命形式具有无限可变性，那么物种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呢？在日内瓦自然学家特伦布利 1741 年进行的水螅实验之后，一种静态的分类学必须被拒绝：水螅被视为一种“植形动物”¹⁹，即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中间形态，同时具有植物和动物的特征。水螅的发现意味着物种固定性的传统认知被打破，“……所有的东西都在彼此循环，因此一切物种也都如此……一切矿物都是或多或少的植物，一切植物都是或多或少的动物”，²⁰而“一切动物都是或多或少的人”。²¹如果物种间的界限如此模糊，那么物种的演化过程中便可能随机产生当前自然界中尚不存在的怪物，比如人类水螅。在狄德罗的思想实验中，人类水螅可能已经出现在宇宙的其他行星上，并且具有水螅一样的繁殖能力：被分解成无数个碎片的“原子人”转化成无数个其他生物形态的个体而继续存活，而这种水螅式的繁殖方式是应当被赞赏的，因为这使得从不同器官分解成为的新个体获得跟与之相应的器官相同的性格和道德特征。

在物种概念被如此去形态化后，该怎样重新理解物种呢？值得注意的是，狄德罗并未尝试以生理学或解剖学的经验事实来解释物种的变化和变异，而是以英国生理学家倪唐（Needham）发现的鳗鱼状微生物的自然生命周期为模式进行描述：这些微生物的生命自发地从水滴中产生，以无目的物质的临时形态朝向未知的目的移动。²²物种只不过是一些引向它们所特有的共同目的的倾向而已”。²³狄德罗在此提及了一种目的的倾向，这种目的只是规范性的，而非建构性的。事实上，基于一种目的秩序一直是狄德罗思想中的矛盾所在：作为一个无神论唯物主义者，他坚决否定自然有一个神性的、外在于自然本身的目的；但如果自然是完全的无序和混沌，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又如何可能？更重要的是，如果相对于人类，怪物并非“他者”，而“人类”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结果，那么差异与同一性概念也不再具有意义。如果所谓的“正常”只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怪异”，那么，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性”？什么是“自我”？换言之，在一个可变的自然整体中，“人”怎么可能将自身认知为一个拥有主观体验和个体独特性的主体呢？

由此而言，“在自然之中，根本没有严格的分别……什么东西都没有一个特殊事物的本质了……因为没有一性质不是为任何事物所分享的……使我们归属于这一类东西而不归属于另一类东西的原因，乃是这种性质的或多或少的量的比例”。²⁴“自然中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关连的”。²⁵狄德罗在生物学的发生学意义上谈论“存在之链”，这条巨链如赫拉克利特之河一般被无数随机的变异填满，没有任何空档，并不能通过当前历史时期具有的物种推断这些物种在过去或者未来的形象。狄德罗反对一种达尔文意义上的生物进化论，既然自然没有秩序，那么人类就无法作为一个固定的物种在历史中获得定位。人类在动物学世系中的位置遭到质疑：当前具有最高智力水平的生物是否就是下一个正在走向并且濒临灭绝的物种？任何物种的短暂形态都只不过是物质运动所产生的不同特性。因此，谈论自然中的个体是无意义的，“根本没有个体……只有一个唯一的大个体，就是全体”，²⁶这个全体就是物质。在这个意义上，一切都是物质的变化，生命也仅仅是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人的出生、生成和死亡也只是物质形式的变换，而形式也只是偶然被选择的，每个形式都只是短暂并且不完善的，“都有它特有的幸与不幸”。狄德罗称这个假设“几乎就是各种现存的和未来的动物的真实历史”²⁷因为人终究会被不断分解成微小的生物，这些微生物在持续蜕变中会重新生成怎样的组织和形态，以及它们何时会发展出最后的组织和形态，这一切都是不可预知的：“谁知道发生于我们以前的那些动物种类呢？谁知道发生于我们人类之后的那些动物种类呢？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在过渡，只有全体是不变的。世界生灭不已，每一刹那它都在生灭，从来没有过例外，也永远不会例外。”²⁸

狄德罗在物种的持续变异与去形态化中看到了人的偶然性，目的论的崩溃与自然的无序之外似乎只剩下变动不居的物质，让“人是什么”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陷入困局。时隔两个多世纪后，超人类主义试图以反思这个问题为前提设计人类的未来。换言之，超人类主义者不仅要问“人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人将要成为什么”。基于如下认知，即人类身体（物质）不完善，需要由技术性身体（技术物质或者非物质）改进甚至替代²⁹，超人类主义者首先拒绝了狄德罗式的唯物主义将活物质视为构成人类生命的基本元素的第一原理，而技术智能无限进化的可能似乎为这个变种的诺斯替主义提供了现实可行性，类器官技术、CRISPR 等基因编辑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应用都在导向后人类的“永生”。在某种意义上讲，超人类主义在一种相对于狄德罗更弱的程度上认同了人的偶然性：人类个体生命的短暂性源于人类身体物质构成的易变和易朽性，人类要克服偶然性，就不能以物质作为构

¹⁸ 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52 页。

¹⁹ zoophyte 在词源上由希腊语 zoon (ζῷον，意为“动物”) 和 phyton (φυτόν，意为“植物”) 组合而成，字面意思是“动物-植物”，曾被用来指代一类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生物。这类生物具有类似植物的固定生活方式，同时也展现出动物的某些特性。在十九世纪及以前的分类系统中，珊瑚、海葵和水螅等生物常被归类为 zoophyte。

²⁰ 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53 页。

²¹ 同上，第 153 页。

²²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93.

²³ 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54 页。

²⁴ 同上，第 154 页。

²⁵ 同上，第 154 页。

²⁶ 同上，第 154 页。

²⁷ 同上，第 145 页。

²⁸ 同上，第 146 页。

²⁹ 诺伦·格尔茨：《虚无主义与技术》，张红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年，第 28 页。

成生命的基本元素。超人类主义的共同意识形态基础中最核心的部分即对自然的拒绝与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的拒绝³⁰；因此后人类应该拥有形态学自由——选择应用哪种技术对自身身体进行完善——和生殖自由——选择繁衍后代时使用哪种生殖技术。

人是什么？新的答案产生于 DNA 携带生物细节信息的发现：人的本质被规定为细胞核中携带密码的结构（DNA）。在这个解释下，人类个体变成一种与身体（物质）脱离的信息模式，以一种数据形态被评估、存储、传输和研究，人是信息。³¹换言之，人不再是由物质分子因其连续性而形成的偶然生物，而是一个以数据模式结构的信息。如果人类由构成人体的物质来定义，那么人的个体必须通过保持身体物质的连续性才可以保证；但如果将人的本质定义为头脑与身体中发生的模式与过程，只要这些模式与过程的连续性得以存储和保留，那么人类个体就能够得以保全。³²按照超人类主义者的观点，非物质的信息与模式作为人类身份的永恒载体不仅能够实现人类的“永生”，还可以根据增强人类的需要和目的予以修改。作为信息的人符合控制论的基本原则：控制论中用反馈回路³³描述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对环境信息的响应，人则是这样一个基于反馈的系统。这个类比将人视为一个基于“刺激-反应”的复杂信息系统。由于复杂系统被看作具有自己生命的实体来讨论，因此具有“自主”功能，系统整体表现出的自组织和涌现特征仿佛具有某种适应性和进化的目的性，因此意义的概念也在新的叙述路径中找到新的解释：意义源自系统规则的物理因果律。这种系统与机械隐喻试图将个体感觉还原为机器模拟或工程方式的数学形式，人类由此成为一个机械实体：³⁴人类感官成为外部信息接收器，感觉的产生则是由信息通过接收路径——物理电路和程序逻辑——被传送到作为中央处理器的大脑，再由大脑基于反馈机制对信息给予反应。在这种叙事中，人是信息，身体是系统，大脑是信息处理器；人在本质上与机器并无不同，因此人类可以通过与人工生命或者人造生命的合成方式实现功能增强。在此我们看到了狄德罗所说“纯粹机械的作用”，所不同的是，狄德罗的机械作用将物质分子的感受性作为机械作用的动力和生命原则，而当代机器的生命原则是信息。

但是，信息的读取标准和对信息的解释并不具有一个普遍准则，不同的解释视角和方式使信息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意义；如果“信息是关于世界的事实”，那么事实总是呈现多重面貌。同样，作为信息的人是否也会因此具有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是信息”的前提下，感觉是否需要一个身体？抑或未来的“信息人”可以被认为是“缸中之脑”的变种，用储存信息的芯片（这个芯片甚至可以不是物理的，而是虚拟的）接受所有外部感觉和刺激？毕竟信息现实无法代替自然世界，如果人被还原为信息并且只能从信息现实中获取生命的养料，那么在一个一切都是理性的设计、都能够被理解的世界中，人类还能够拥有完整生命体验、获得生命的意义吗？

三、物质活性与自发生殖

在关于物种变化的解释中，狄德罗一直坚持一种物质一元论，即世界上只有一种实体，那就是物质；物质是包括生命、意识和思想在内的所有现象的基础。在这种观念下，一切变化都是物质的运动，狄德罗就此提出他需要研究的“两种重要现象”：“一种是从呆板状态到感受性状态的过渡”，即物质如何在两种不同状态之间变化，以解释生命的起源；另一种是“自发的生殖”，即指有生命的物质分子如何通过聚合的方式长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在谈论一切变化之前，狄德罗必须回答他自己在《对自然的解释》（Interprétation de la nature）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很显然，一般的物质分成死物质（matière morte）和活物质（matière vivante）。可是，为什么物质不是单一的，或者全部是活的，或者全部是死的呢？活物质是否总是活的？死物质是否始终和真正地是死的？活物质是否会死亡？死物质是否会开始活过来？”³⁵如果自然界中既存在死物质——无机物与非生命体，又存在活物质——生物体，而非生命体与生命体之间也在不停地进行物种转化，那么，在非生命体促使其发生变化的活性从何而来？换言之，死物质是如何转化为活物质的？尽管布丰（Comte de Buffon）提出一种观点，即死物质有可能在适当的条件下通过某种未知的过程转化为活物质，但对狄德罗而言，这种解释过于模糊，这样的区分依然为物质的转化设置了障碍。因此，狄德罗做出如下假设：一切物质（包括死物质）都具有潜在的感受力（sensibilité），正是这种能力赋予物质生命的活性，“只有通过假设生命是物质内部普遍存在的一种能量形式的结果，才能形成一个充分的唯物主义的生命观”。³⁶“感受力”在狄德罗的意义上获得了相较于医学领域更大的概念范围，从感觉的能力变为一切物质中的统一元素，并分享和医学领域共同的重要性：作为生命的基础。³⁷

为了说明“怎样使一个物体从迟钝感受性的状态过渡到活跃感受性的状态”，³⁸狄德罗构想了关于法尔可内雕像的思想实验作为消除两种物质间活跃感受性的障碍的尝试：把这个雕像拿来，“放在一个臼里，用杵使劲捣”，直到大理石变成粉末，再混合到腐殖土中进行腐烂发酵；通过食用这个腐殖土中种植的植物，大理石最终被吸收

³⁰ 同上，第 30 页。

³¹ 詹姆斯·A·赫里克：《人类未来进化史：关于人类增强与技术超越的迷思》，赵翌、陈天皓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93 页。

³² 同上，第 100 页。

³³ 反馈机制指通过将系统输出的结果（即信息）返回到输入端，以此调整和优化系统行为。

³⁴ 同 2，第 97-98 页。

³⁵ 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08 页，译文有改动。

³⁶ Dixon, B. Lynne: *Diderot, philosopher of energy: the development of his concept of physical energy, 1745-1769.*, UK: University of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1988, p144.

³⁷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University of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01, p82, note11.

³⁸ 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22 页。

进入人体，成为人类肌肉物质的组成部分，并由此转化为具有感受力和思想的活物质。³⁹狄德罗在此接受并发展了一个伊壁鸠鲁式物质循环的解释模式：⁴⁰“伊壁鸠鲁曾主张大地包含着万物的种子，动物界是发酵作用的产物”⁴¹，一切有形物质都源自同一种无形物质的聚合、生长或者分离：生命的开端是“一个活的点子……不……起初什么也没有，后来有了一个活的点子……在这个活的点子上粘上另一个，又粘上另一个；这样继续不断地粘下去，便得出一个整体的东西”。⁴²“什么都没有”恰好说明物质分子无生命的原始状态，狄德罗以此描述人类个体与自然一切物质的同质性：达朗贝这个“欧洲最大的几何学家”起初只是“一个乌有”，他的出生与生长和法尔可内雕像的大理石并无二致。“那些将要形成我所说的几何学家的最初根苗的分子，是分散在两个人的年轻脆弱的机体里面，随着淋巴液分泌出来，随着血液循环着，直到最后才奔赴他们准备结集的场所——他父亲的睾丸和母亲的卵巢里。于是这个稀有的种子便形成了”⁴³，而达朗贝母亲的妊娠过程和达朗贝本人的成长则被简化还原为“吃和另外一些纯粹机械的作用”的结果，即遵照一个“四句话的一般公式：吃，消化，吸收养料，长大成人”，⁴⁴狄德罗将这些物质因素视为对一切生物形成情况的一般说明，并以此拒绝了预成论⁴⁵和自然目的论。

人是一个“整体的东西”，但这个整体是如何形成的？在狄德罗看来，物质分子的组合只能构成一个集合体，仅仅是一个“由许多细微的有感觉的东西构成的组织”⁴⁶，但一个动物是“一个全体”“一个完整的系统”。既然全体不能被还原为部分的组合，那么一个由物质基质组合而成的动物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是一个能够意识到其自身完整性的系统呢？关键问题是怎样看待物质分子——即前文所说的“活的点子”——之间的连接关系。狄德罗在此区分了“毗连性”与“连续性”：前者仅仅具有物理相邻意义上的连接性，即只是被排列在一起，而后者则意味着分子个体的融合，“同化之前有两个分子，同化以后就只有一个”⁴⁷，物质分子的同化伴随着分子自身感受性的同化，不同于“两个呆板块体的毗连”。单个分子的感受性由此转化为人体这一共同整体的感受性，狄德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意识的复杂性与其作为其一部分的物质基质相协调”，⁴⁸使人的自我意识成为可能。

蜂簇与人体器官的类比可以被视为狄德罗对“自发生殖”的形象解释：如果把蜂房视为物质的总体，那么从里面飞出的蜜蜂就可以被看作从物质整体分解产生的物质分子；为了使蜜蜂之间实现真正的“连续性”，狄德罗设想单只蜜蜂的脚被融化，使它们能够以脚勾脚的方式生长在一起；这些蜜蜂重新聚集起来形成蜂簇的过程则被视为物质分子的自发生殖。蜂群并非仅仅是“蜜蜂单子”的简单集合，相反却总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活动。换言之，似乎存在一个“集体意识”在统一指挥蜂群的活动，其中每只蜜蜂的行为都具有协同性，朝向一个集体任务的目标。如果将这个蜂群类比为一个人体，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像蜂群里单个的蜜蜂，“不过是一些单个的动物，由连续法则把它们放在一个总的结合体、统一体、同一体中罢了”。⁴⁹狄德罗进而再次以对人体自发生殖过程的详细描述明确地拒绝了目的论和预成论：人类个体生命源自活物质分子的活动聚集，继而这些分子生长为纤维和纤维束，作为“纯粹的感觉系统”的纤维束通过“吃，消化，吸收养料”等“纯粹机械的作用”在其末端长出不同的器官，同时产生出“记忆、自我意识”和“有限的理性”。换言之，人类灵魂被视为一种具有感觉和意识能力的特殊感觉物质，能够通过器官接收的信息回应外界刺激。既然人并非一个固定物种，不具有恒定形态，那么人类可能在未来生长出不同于现有五官类型的感官，而感官的形态、类型和什么时候产生则是自发并且不可预知的；同时，由于一切物种间的最根本差异取决于构成各物种的纤维束的不同形态和类型，通过人为手段促使纤维束产生变异，就可以造成物种的变异，生产出各种无法预知的怪物。

四、技术活性与永生悖论

将技术元素⁵⁰和奇点⁵¹假设相结合或许可以作为超人类主义对狄德罗的“两个重要现象”的当下回应，即替代自

³⁹ 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2-123页。

⁴⁰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83.

⁴¹ *ibid.*, p.147.

⁴²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138.

⁴³ *ibid.*, p.124.

⁴⁴ *ibids.*

⁴⁵ 预成论 (Preformationism) 是一种生物学理论，主要流行于 17 世纪和 18 世纪。这一理论试图解释生物的发育和繁殖过程，认为所有生物在其最原始的形式中就已经完全形成了，只是在生长过程中逐渐显现出其预定的形状和结构。预成论与渐成论 (Epigenesis) 相对立，后者认为生物的形态是在发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⁴⁶ 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9页。

⁴⁷ 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9页。

⁴⁸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88.

⁴⁹ 同 1，第 142 页。

⁵⁰ 技术元素 (The Technium) 是凯文·凯利 (Kevin Kelly) 在其著作《科技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 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由所有技术和人工制品组成的综合系统，包括工具、机器、软件、信息网络、文化实践和制度等，并具备以下四个特征：一是自主性：技术元素被视为一个具有自身进化逻辑和目标的独立系统，能够自主地发展和演变；二是复杂性：技术元素是一个高度复杂、相互关联的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和依赖关系；三是生命特征：技术元素具有类似于生命系统的特征，如自我组织、适应性、进化和增长；四是全球性：技术元素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络，跨越地理和文化的界限，连接世界各地的技术和信息。

⁵¹ “奇点” (Singularity) 是由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 (Ray Kurzweil) 提出的一个概念，特别强调技术进步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技术的发展速度将呈指数级增长，导致人类社会和文明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在这个临界点之后，技术的发展将变得难以预测和控制，人类社会将进入一

然行使人类进化权利的技术自身怎样获得原初活性？技术活性在何种意义上使朝向后人类的变化得以发生？

根据技术元素的解释，活力并非源自物质，而是源自物质形式所包含的信息和能量，这些信息和能量随着技术进化而形成智能；奇点的到来使智能进化到一个较高等级，相应地具有较高等级的活性，由此将宇宙的哑物质（死物质）转化为智能物质（活物质）。智能物质同样是一种可以按照自身需求自组织的“活物质”，所不同的是它具有更大的活性和强力：狄德罗意义上的“活物质”只是在自然整体的无序中实现物种形态的短暂有序，其自身则必须受制于存在之链的历史变迁；而智能物质能够操控其他一切宇宙能量，并且为宇宙制定一个符合自身目的的顺序。值得注意的是，奇点将为宇宙重新制定一个符合智能意愿的顺序作为它的目的论的终点，是否暗含着一一种在较弱的程度上的对“宇宙秩序是一个幻觉”这个狄德罗式判断的认同？自然的无序使人类理性认知世界的可能性遭到质疑，而为宇宙重新设立秩序，是否已经将人类置于造物主的位置和视角？然而，这种具有超验性和僭越危险的愿景必须认可两个重要前提：其一，既然技术元素和奇点的产生与自然和古老的生命同源，那就意味着这个秩序是由自然内部发生，而非从外部加诸其上的东西；其二，这个新的宇宙并非自然的替代物，新的秩序亦并非自然整体的秩序，而仅仅是人类理性在技术维度下对自然的认知结果。

如果关于奇点的技术发展和高级智能的出现假说成为现实，那么某种超级智能有可能在某一个瞬间代替人类接管整个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将如何期待这个智能具有人性的道德和价值观？如果信息成为后人类的生命动力，那就意味着后人类的人性和人格（倘若后人类还具备这两种人类特征）皆由技术智能塑造。我们无法阻止技术智能将计算作为重塑后人类的本质依据，也许“如何基于一种计算的规则重新创造世界秩序”将是最有可能或者最先产生的机器意识；在这种假设之下，未来的“人性”将完全依赖于技术智能根据不同的计算逻辑和结果择优选取。因此，“人性”必然是不可确定的，其流动与变化取决于技术智能对计算规则的不断修改与优化，而修改依据则是对宇宙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在人类滥用技术理性、将自然还原为工具和“资源”之后，人类自身也沦为技术的材料和工具。鉴于技术在当下呈现出的计算本质，这种状况在未来或许面临加剧恶化的可能。

与狄德罗关于生命如何从物质中产生的叙述相似，超人类主义者关于技术与智能的叙事也在发生学意义上解释技术进化论，并赋予其形而上学的意义。在狄德罗看来，人的偶然性否认自然的秩序和目的；后人类主义者为了使超人类智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从一种目的论神学的视角来解释技术的进化，试图为未来的人类、自然和宇宙建构一个必然的秩序。但这个智能神也可能是一个试图建立集权控制的危险政权的“邪恶的魔鬼”（Evil Demon），会在他建构的算法宇宙秩序中随意修改和删除以信息形式存在的个体，打破后人类“永生”的期望。

在这个意义上，超人类主义者博斯特罗姆致力于以一种模拟假设（simulation hypothesis）来建立后人类愿景与技术进化必然性之间的联系：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永远生活在由未来的高级文明设计的计算机模拟世界中，这些高级文明即未来某一时期的后人类，模拟出当前的“人类”只是为了研究已不复存在的祖先。博斯特罗姆在模拟假设中引入了一个宗教类比，即后人类对人类世界的模拟与基督教的创世具有某种相似的意义：在当前人类的视角下，后人类以一种全知的（omniscient）神性超级智能——甚至以违背宇宙规律的方式（如库兹韦尔所言）——干涉、控制人类世界和人类生命。模拟者被赋予一种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即模拟生命必须受到合理对待及免受伤害。这种解释让模拟行为和过程具有一种救赎意味，似乎模拟生命被导向一种末世论的必然⁵²。但问题在于，模拟者并不必然是善的，我们没有理由假设技术智能与人类具有相同的价值或道德取向，一旦模拟生命失去研究价值，或者研究计划与实验参数发生变化，模拟系统可能会被终止或者修改，人类生命世界也将不复存在；抑或模拟者自身亦可能被持续进化出的更高文明所替代，与人类一样面临存在性风险；一旦模拟者被灭绝，模拟将被中止，作为模拟生命的人类也将随之消失，甚至人类可能灭绝于一场导致模拟系统意外崩溃的灾难。换言之，无论现存人类世界和人类生命是否遵循模拟假设，这种后人类的理想都不能消解人类存在的偶然。因此，在后人类主义的视角下，“什么是人”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人类”甚至可能不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在将人的本质解释为信息而非物质之后，人的偶然性被放大了。

五、结语

狄德罗基于物理自然和生物自然提出的人的偶然性问题是否如同超人类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能够在一个技术的自然和宇宙中被克服？事实上，只要人类的变化不可预知，只要人类还需要在物理宇宙和自然中生存，人的偶然性就不可能被克服。后人类可能不仅仅有五种感官，也可能拥有人类目前尚不可知的生理或者物理特征。如狄德罗所言，“谁要是断定不可能有第六种感官，……就是个冒失鬼了”。抑或后人类根本不需要任何感官作为信息的中介，而是以身体表面的任意部位就能行使全部感官的功能，就像荷兰哲学家赫姆斯特休斯（Hemsterhuis）

个全新的、未知的状态。奇点的到来具有如下三个特征：一是指数级增长：技术进步的速度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呈指数级增长的。这种增长模式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尤为明显。二是技术加速：技术的加速发展是奇点的核心特征，表现为技术的进步速度越来越快，每一代技术的使用寿命越来越短。三是智能爆炸：在人工智能领域，奇点可能导致“智能爆炸”，即机器的智能迅速超越人类智能，引发一系列技术和社会变革。据库兹韦尔预测，技术奇点将在21世纪中叶（大约2045年左右）到来。届时，人工智能将超越人类智能，人类社会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⁵² Nick Bostrom: *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41-142.

认为的人类感官的最完善状态——整个身体变成各种器官。甚至后人类终有一天不再需要任何物质身体，仅仅作作为信息处理的模态和过程而存在。事实上，超人类主义者的“永恒”面临着与狄德罗的“偶然”同样的境况：承载人类个体的信息持续变易，没有终结。无论如何，这些假设终究可以回溯到狄德罗的问题：变化什么时候发生？唯一的区别是，对狄德罗而言，变化首先是个体发生学意义上的；而对超人类主义者而言，变化首先在整体的意义上发生。

参考文献：

- [1]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M].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2]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 [3]诺伦·格尔茨.虚无主义与技术[M].张红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 [4]詹姆斯·A.赫里克.人类未来进化史：关于人类增强与技术超越的迷思[M].赵昱、陈天皓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 [5]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M].UK: University of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01
- [6]Dixon, B. Lynne. Diderot, philosopher of energy: the development of his concept of physical energy, 1745-1769[M]. UK: University of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1988.
- [7]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in Novum organum, New Atlantis, Advancement of Learning/Novum Organum/New Atlantis[M].Robert Maynard Hutchins Mortimer J. AdlerEd.Encyclopaedia Britannica:University of Chicago,1982.
- [8]Nick Bostrom. 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M].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Diderot's 'Monster' and the Posthuman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Human Contingency

Xia Zhengzheng¹

¹*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Diderot's study of "monsters" constitutes a transformation of Bacon's paradigm of "natural deviations." His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underwent a significant shift from teleology to organic-mechanical materialism: initially influenced by Shaftesbury's teleological conception of nature, he later rejected this framework due to its explanatory inadequacy regarding monstrous phenomena, ultimately reconceptualizing monsters as contingent products of natural disorder. This epistemological shift reveals a fundamental limitation of transhumanist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s long as human transformation remains unpredictable and ontologically dependent on nature, the essential contingency of human existence cannot be overcome through techno-teleological schemes, even those proposing radical posthuman futures.

Keywords: Diderot; monster; transhumanism; contingency; teleology